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吴洪成, 姜柏强, 刘芳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为挽救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 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作为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在清末引进中国。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有着丰富的内涵, 主要通过清末的留日学生, 翻译、介绍教育理论书籍, 来华日本教习三个途径在我国传播, 经历了引进模仿和推广应用阶段, 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可, 在长期的教育学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赫尔巴特; 五段教授法; 近代中国; 教学方法; 教学论

中图分类号:G 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3)12-0033-06

赫尔巴特(Herbart, Johann Friedrich 1776~1841)德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在西方教育史上, 被誉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他认为教育作为一种科学, 是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作为基础的, 前者指明目的, 后者指明途径、手段。科学教育学的构成部分包括目的论、训育论、管理论及教学论。赫尔巴特教学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多方面兴趣。兴趣活动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注意、期待、要求、行动。有了多方面的兴趣, 学生就会产生“专心的活动”和相关的“审思活动”, 由此掌握新知识, 形成新观念。他通过对兴趣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 提出课堂教学的形式阶段论: 明了(Clearness)、联合(Association)、系统(System)、方法(Method)。后来他的学生把这四段加以发展, “戚勒更分明了为分析及综合二者, 增四段为五段。莱因为教授之便利上更改段名为预备、提示、联合、统合及应用。即世所称五段教授者是也”^[1]。这也就是教育史上与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做中学”思维五步法以及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五环教学法”相提并论的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教育总体改革, 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巨大, 堪称教育领域“千古未有之一大变局”。

“癸卯学制”颁布以前, 依然是以科举选士制度为核心, 私塾、官学和书院为基本形式, 仍可归于适应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制社会需要的传统封建教育体制。伴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变化, 传统教育体制无可挽回地分崩离析, 那种几千年不变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与近代教育的发展是难以适应的。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恰在此时传入我国, 并对清末民国早期的中小学课堂教学理论及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的传播

据现代教育家俞子夷《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个回忆简录》一文的回忆: “首次大战前, 小学教法主要从日本输入, 而其内容与本质主要是基于五段法的一套。”^{[2]478}清朝末年, 这种教学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传入我国。

(一) 清末的留日学生

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输入、引进西方近代教育体制, 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间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规章法令。在此期间, 日本学校采用的新式教学方法以五段教授法为主。1887年德国教育家爱弥尔·赫

收稿日期: 2013-07-02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3JY049)

作者简介: 吴洪成, 河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教育史研究。

斯耐克特(Emil·hausknecht)受聘日本帝国大学,首次在日本传播经过赫尔巴特学生加工改造过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说,推动了五段教授法在日本的传播。根据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特点,日本学者在阐述教授论时大都从“兴味”,即兴趣出发。例如,牧濑五一郎在《教育学教科书》中指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养成学生对事物的“兴味”,即培养儿童多方面的兴趣,使学生不但在学校里愿意学习,而且离开学校后还能发奋学习,以便达到或接近“教育之大目的”——“养成伦理学及心理学上完全之人物”。^[3]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日本学者主张采用相应的“材料”和“方法”,其中材料包括“教科”(即课程)和“教材”,而“方法”则是指赫尔巴特学派提倡的五段教授法。

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继洋务运动留学欧美之后的第二次留学潮,史称留日运动。留日学生人数在“新政”改革以后逐年增加,1905年至1906年达到最高峰,每年计8000人以上。留日学生中主要学习普通学与速成教育,从当时中国的形势来看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师范、军事、法政及经济等专业领域。学师范最为集中的是弘(宏)文学院,国内有很多的省份都派遣学生前往学习,当时担任宏文学院教育学教习的是日本赫尔巴特学派重要人物波多野贞之助和樋口勘次郎。其中波多曾肄业于德国耶拿大学,师从赫尔巴特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莱因教授。他的授课讲义曾由直隶、湖北等地的留日师范生整理、编印后,在国内广为刊行。

这批留日学生把包括课堂组织中形式阶段教学程序在内的赫尔巴特教育学思想带回国内。近代教育家陈宝泉在1922年5月《新教育》杂志第4卷第5期撰文评述教学方法在中国的改革与实验时指出:“清末初兴学校的时候,真不知教授法为何事。曾忆初到日本,听教师讲五段教授法时,以为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儿童的本能,实为新教育之最大特色。所以当时官私编辑的小学教授用书以及各小学实用的教授法,殆无一不是适用五段教授法原理的。以至今日,恐尚未能脱以上的范围。”^[4]序言

同时,学习师范的留日学生回国后基本上从事各类学校的管理(学堂监督、教务长)教学(学堂教习、教员)工作,如两广地区派赴日本习速成师范的留日学生,回国后,被各地“纷纷指名延请”;山东巡抚命令通省十府二州的师范传习所“以留日学生卒业之速成师范生充教习”。1907年5月,学部规定出洋的官派师范留学生,毕业后回国,必须充当教习五年。1909年3月,学部奏请“凡出洋

学习寻常师范,及于光绪三十二年臣部奏准限定游学资格以前出洋,入专为中国学生设立之长期师范班肄业者,毕业回国,拟令尽义务五年,俟五年期满后,均按照初级师范毕业优等奖给出身官阶外,仍照教员五年期满之例准保升阶;其不尽义务者,概不给奖,庶不致过于向隅,亦不致失之宽泛”^[5]。这些措施对鼓励师范留学生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无疑起到了限制和促进的作用,他们直接把赫尔巴特的学说传播给国内的师范生,并通过这些师范生把当时在日本流行的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运用到具体教学活动中去。更多留日学生供职于各省的中小学堂,在基层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他们也成为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实践者。还有少量的留日学生如严修、杨度、范源濂、景耀月、董鸿祜等回国后身居教育界要职,对清末民初以赫尔巴特教育学为主流教育学理论流派的确立起着决策与引领的作用。

(二) 翻译、介绍教育理论书籍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形势出现了新变化。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冲击、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签订惨痛的剧变,迫于亡国灭种的社会灾难与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压力,1901年,清末举办“新政”,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兴学诏书”,由此揭开了新世纪教育革新的崭新图谱。借此东风之便,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建设及教育学学科的研究与拓展便成为不可推辞的职责使命。最早在我国出现的教育学大都来自日本,而当时日本的教育学是从德国学来的赫尔巴特教育学。20世纪前后,西方一些著名教育家的学说和著作,也大多假手日本介绍到中国来。除此之外,夸美纽斯、卢梭、洛克、斯宾塞、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赫尔巴特等人的传记、学说和著作,也曾各种刊物上出现,尤其是我国最早创办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对此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介绍,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另有大量介绍欧美教育学说流派、教育制度及教育现状的文章和著作,也主要是通过日本翻译过来的。进入20世纪的门槛,我国就有了专门教育学著作的传入。^[6]《教育世界》于1901年介绍的汤本武比古著《教授学》是有代表性的。该书共分14章,依次为:小学校教师;教授通义;兴味;类化;教授材料之选择及参互;教授之统合;教授材料之处置法;指示大旨;第一形式阶段即预备;第二形式阶段即授与;第三形式阶段即联合;第四形式阶段即结合;第五形式阶段及应用;教授原则。从该书结构中就可看出,赫尔巴特派教学理论和方法占主导地位。甚至附录的古谣教案、

算术教案、自然教案、地理教案和历史教案均选用赫尔巴特的后继者莱因编制的范例。

各地的有志青年既为求新知而同赴东瀛留学,又有日本语言的优势和一定的专业能力,再加之大多数选师范、教育专业的莘莘学子都抱着通过革新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开发民智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的强烈意愿,因此,翻译传播新知识的重任就落在他们的肩上,大量赴日的留学生成为了翻译和介绍日本教育理论著作,传播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生力军。

(三) 来华日本教习

在20世纪初叶的中日教育交流中,除了留日教育的主动派遣之外,还有大批的日本教习被聘请来华任教,其中以袁世凯执掌的直隶省最为显著。早在中国学校还没有大批聘用日本教习之前的1891年,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之时,就明确提出“延东西洋教习分课文武实业”的想法。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书后,张之洞即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提出,“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兴学次序应是“师范学第一”。为了尽快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一方面他已从湖北选派31名优等生赴日本专门学习师范;同时在省城创办师范学堂,以梁鼎芬为监督,留日学生陈毅为堂长,聘日本师范教师一人充任总教习。以教育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为师范教育的核心课程。^[7]聘用日本教习在20世纪初的兴学热潮中已是各地兴办学堂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日本教习在各级各类学堂,尤其是师范学堂谋事,教育、心理学各分支科学大都由日本教习担任。俞子夷在关于现代小学教学方法演变的回忆录中说:“初办师范时期,许多新学均请日本教师讲授,教育部门各科,包括教授法,亦多由日籍教师担任。当然,任教者亦有若干归国留日学生,但人数不多。两者同出一源,而日本通行的也只有五段法。”^{[2]474}当时在华的日本教育学教习不仅传授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知识,还对其形式阶段教学程序非常重视,严格训练学生以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授法编制教案。

二、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的接受

“接受”较之“传播”在语义上存在差异,前者更带有认同、采纳、吸收、实施及推行的意味,这是传播层面的延续递进或超越转化,具体地说应该是学说、理论输入后转向行为或尝试实验的取径。

(一) 引进模仿

自废科举以来,清末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时期大力发展新式学堂、推行班级授课制度。各地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03年至1909年间,“学校数由719所增加到52,348所,增加73倍”^[8]。但是,很多教师都苦于不知如何应对从讲经诵读的私塾教育到学科知识课程实施的基本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引进一种易于掌握、便于处理日常教学工作,又有助于人们探讨教学问题的教学方式方法,来规范各地的中小学课堂教学活动。因此,具有系统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五段教授法在中国认同并推广开来。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初等学堂章程》规定各校应采用班级制授课,各类师范学堂均须教授教育科目,还明文规定应采用形式阶段教授法:“各教科教授详细节目,讲授之时不可紊其次序,误其指挥,尤贵使互相贯通印证,以为补益。”^{[9]183}类似的内容也详见于同时公布实施的《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有关法规条文中。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除了普通中小学热衷运用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外,有些私塾也深受其影响,积极谋求教学上的改良。如1904年7月间,沈载仪于上海浦东龚镇创立私塾改良会;1905年6月,上海绅商学界筹资成立总会,制定《上海私塾改良总会章程》,言明其宗旨是“各教习照常各自收徒讲授,馆室照旧,脩金照旧,惟教授悉用新法,重讲解不重背诵,先求讲明蒙学新书,然后由浅入深,实事求是,务求到馆一日,即获一日之进益。”^{[9]317}

清末的视学、督导官员曾将小学教员的教学组织方法是否运用了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来进行作为重要项目来衡量。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直隶省视学李搢荣《调查武清县东北两路各学堂报告》对该县属下牛镇初等小学堂情形的描述称:“教员张作舟,系通州初师毕业生,纯谨老成。聆其讲授修身,于五段教授法稍欠研究。体操有纪律而少精神。观其课程表,历史每周二小时,读经一堂,时间长至七十分钟,均商令照章改良。”^{[9]279}但是,这一时期五段教学法在中国的接受方式,主要是模仿和移植。诚如俞子夷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五段教法从讲演中学来,还是仿用讲演容易。五段法仅仅在讲义或口头谈话中推行,小学课本里很少出现。”并且,也只限于几个都市中的师范附小和模范小学而已。“这种小学,能有几个!先进的教师提倡用启发式教法代替注入式。”^{[2]474-475}这表明西方近现代新教学方法在中国推行的历

程是曲折的,沿续数千年之久的个别教学、读书背诵及戒尺棍棒为特征的传统教学方法在相当的范围和时段内依然故我,作为一种旧有势力盘桓经久、阴魂不散,形成一种抗拒的包袱阻碍着教学革新的道路。

(二) 推广应用

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真正大范围的推广应用还是在1906年之后清末宪政期间(1906~1911年),适应立宪政体建设对民主政治及国民素质的新诉求,国民义务教育成为教育的热点。为了提高办学效率、解决师资缺乏、学生分散、设备不足等制约教育“瓶颈”的困境或矛盾,单级教授法(即现代教学论中所称的复式教学)格外受到青睐。例如是否接受过单级教授法的培训曾一度成为教师资格认定的一项条件,它与学历文凭一道成为教师任职资格的重要标准。单级复式编制的教学组织成为五段教授法的有力载体。更确切地说,单级教授法实际是一种教学模式,在具体的课程实施环节更多采用五段教授法推演出的形式阶段教学加以操作或实施。

1909年初,江苏省教育会为促进普及教育,咨呈江苏总督端方,提请派遣杨保恒、俞子夷及周维城三人,赴日本考察单级复式教学编制组织、设备情形并一切教学方法。回国后江苏省教育学会就立即邀请三人作考察报告,参加会议的有100余人,会上俞子夷对日本单级复式课堂教学做了详细汇报。接着,开始筹办单级教授练习所,共办了两届。“单级只是编制方式,教法实质仍不外日本通行的那一套所谓赫尔巴特的五段法”。^{[2]471}

1910年8月23日~1911年8月5日,学部连续发文、上奏推行单级教授法,代表性的如《咨覆两江总督提倡单级教授及设单级教授练习所应准照办文》《奏拟定单级教授二部教授办法折》,对单级复式教学编制的特点、价值、内涵及与单班教学组织的差异等作了条分缕析地阐释:“为今之计,若按年级归并,以为画一,而城南之儿童,不能至城北而就学。若细分班次,多设教员,而有限之经费,不能供无限之使用。窃谓救弊补偏之策,莫如速办单级教授。查单级教授,能以一教习于一讲堂,同时教授不同级不同学科之学生。日本近来极研求此种教授。于江宁,近日初等小学生徒少而学级多之情形,最为合法。”^{[10]667}这里所说的意思十分明白,单级复式编制法有助于克服小学办学中经费、师资不足困顿以及学生居住分散、求学交通受阻的现状。学部的“奏折”中又进一步分析:“查单级教授之法,与普通教授不同。普通教授,按年级相当之学生

以分班次,各班须各任一教员;单级教授,则合年级不同之学生若干班编为一级,一教员可兼教各班。两者相衡,一则需员多而费繁,一则编制紧而效用广。欧西日本之教育所以能日新月异盛者,大抵得力于单级教授为多。中国兴学伊始,地方财力既极困穷,兼之各校之内,学童人数无多,程度复不齐一,居今日而欲谋普及,舍单级教授更无审端致力之方。”^{[10]669}除了从教学原理及有效教学组织方面作更深层分析外,还就单级教授法与普及国民教育的相关性作了充分肯定,从而提升了其教育与社会的价值赋予。

在实行单级教授的学校或班级里,五段教授法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因此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得以扩大和发展主要是借助单级教授法的提倡和传播。在此之后,讲习单级教授法之风颇盛,俞子夷、杨宝恒等参加考察的三人,均被各地频频请去演讲。这样,他们就把单级复式教学组织编制和五段教授法的程序阶段模式联合起来加以运用了。

(三) 调整改造

文化与思想传播及接受过程在同时也是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文化加工改造的过程。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在中国的流行已经不是德国时的纯粹状态,认为所有科目的教学都遵循此法的步骤,一成不变,凝固机械,反倒失于迂阔,不切实用,流于繁琐,而贻笑大方。因此,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常常稍作变通,教学程序设计中常采用三段或者四段,能够体现教学的要领,也可以省略一部分顺序。

辛亥革命后教学方法的研究、改进进入一个新阶段。俞子夷、杨保恒、周维城等从上海移师苏州,在江苏第一师范学校及其附小继续进行教学方法的研究和试验。江苏一师附小成为民国初年研究教学方法、实验和推广五段教授法的“大本营”。他们根据各学科的实际进行了灵活的变通,如在国文教学中,五段简化为四段,在算术教学中,五段简化为三段,但都力求遵循一定的教学程序,教法上做到有章可循。这里的教学过程就是当时他们所谓的“教顺”,即上课的顺序,后称“过程”。俞子夷回忆说:“我们一年余的演示、讨论,集中在建立一套‘教顺’。”以国文读法为例,一般过程为:事物教学,目的指示,课文大意,新字解释,课文讲读,讲读练习,段落大意,文体结构,应用练习。事物教学算是“预备”;课文大意、新字解释、课文讲读均属“提示”;讲读练习为提示的巩固和加强;段落大意偏于内容方面,文体结构偏于形式方面,二者统称“整理”,用以替代“比较”和“概括”;最后的应用练习即“应

用”。算术又省“整理”阶段,故只有三段。这种“教顺”问世后,因其实用性、操作性强,受到热烈欢迎,教师用以备课,师范生用以实习。以后,还曾整理修订,印成小册,供参观者参考,同时也作为师范生的实习指导蓝本。^{[2]478}为进一步研究教学方法,江苏师范附小成立了联合会,并与浙江、安徽联合,成立三省联合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展览会及讲习会。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通过上述实验活动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接受并推行。

三、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的历史反思

综上所述,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作为一种既简便易行,又能为广大小学教师所接受的教學方法,被许多中国学者接受和推崇是很自然的。我国 20 世纪初开始放弃个别教学方式,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对免除这种转变造成的课堂教学中的混乱,对于新型师资的培养,都提供了许多便利,有助于教师按照一定的规则程序,进行编制教案和实施教学,尤其对经验不足的教师帮助更大,这是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在中国一开始就受到欢迎,并能在中小学教坛持续高温,独领风骚数十年的重要原因。

近代教育家俞子夷对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的中国化改造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单级教授练习所的举办正式开始了五段教授法在中国的推广,辛亥革命后以江苏一师附小为核心的实验研究,把五段教授法应用于小学国文、算术、理科各学科教育,力图“建立各科教法的初步基础”,体现了方法论上注重实验的特点。此后,他把教学法的研究引向深入,在取得实验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1904 年《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教育”学科教学中,第三年是“教授法”;民初“壬子癸丑学制”中师范教育的法规章程对教学方法的要求更加突出,并加以具体化。受教育政策章程的导向驱使,清末民初教育界对教学法的探讨越来越重视。在吸收赫尔巴特教学法的基础上,国人开始自编教学法教材及专题著作。如朱孔文编《教授法通论》(时中学社 1903 年版);商务印书馆编《教授法原理》(商务印书馆 1913 年版);侯鸿鉴编《最新式七个别单级教授法》(上海中华书局 1914 年版);李廉方(字步青)的《新制各科教授法》(上海中华书局 1914 年版);蒋维乔编《教授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916 年版);余奇编《教授法要览》(商务印书馆 1917 年版);钱体纯编《教授法》(商务印书馆 1917 年版)等等。这些教学论的早期成

果更多地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如朱孔文的《教授法通论》,虽模仿日本教学论,借鉴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成分很多,但作者在吸收的同时,作了一些适合于我国实际的变通尝试,提出了知、情、意的教学。侯鸿鉴的《最新式七个别单级教授法》系统论述了我国单级学校的设备、编制、教授、训育及教师资格等多方面内容时,明确指出:“践教授之阶段,执各阶段而揭其顺序,方法之大要。”又在各教科教授之方法一章中,具体阐明了预备、提示、总括、应用(或提示、练习、应用)的教授阶段。李廉方的《新制各科教授法》是中华民国初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师范学校教科书,该书重点论述了所谓“教段”问题。“教授之次序,曰教段。教段之程式,自海尔巴脱(即赫尔巴特,笔者注)之论断而大体始定。至莱因氏而大成,所谓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和应用五段教授法是也……就我国近来传播之势言之,有以为比较总括段并于提示段称为三段教授法者。有于预备之中,提出指示目的一项,特别揭明于指示者。今取最新之式,分为预备、提示、练习和整理四段。就中以提示、预备为主。此段在实际上理论上皆有正确之研究,而通用于知识教材与技能教材无一不合者也。”^{[11]16}李廉方主张在借鉴赫尔巴特学派五段教授法的基础上,“教授时,因教材之性质与儿童之心情时有殊异,究宜临机活用而不可拘泥其程式也”^{[11]18}。具体而言,在教学过程中可灵活使用四段教授法(预备—提示—练习—整理)或三段教授法(预备—提示—应用)。蒋维乔编的《教授法讲义》,主要思想是受赫尔巴特学派影响的,如教学方法介绍的是五段教授法,教学目的特别推崇赫尔巴特的兴趣说。但是该书融会贯通了日本教法与自己的经验,主张教学、训练、养护三者要互相结合。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实用主义教育学及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相继传入我国并进行有声有色实验,但实际上也仅是在大中城市的少数学校被采用,而五段教授法为核心的形式阶段教学虽然受到一些批评及过激者、理想者的非议,在大多数学校却仍然盛行。盛郎西 1924 年在《教育杂志》上撰文指出:“自从设计法的一部分学者提倡而且为一部分学校推行以来,从前的形式教法(五段教授法)大受非难;不过平心讲起来,从前的形式教法也实在有许多精义,尤其对于缺乏经验与创造力的教员可以供给一个可以遵循的路程。……我是赞助设计法的一人;但我相信形式教法现在还没有到天然淘汰的时机;听说有些学校施行设计法的结果,并不见得能增加教授效率;就是采用

设计教法,也大都未应用于各科全体。形式教法果然有太嫌拘谨的地方,但是未尝不可加以变通或修正;不合宜的地方当剔除,含有真理的地方,则仍当保存。”^[12]

总之,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在中国近现代曾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我国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五段教授法在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完善教学体系价值发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以教师为中心只重视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的学,导致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养成主动的精神;以学科课程和教材为中心,而不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过于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忽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教师偏重教学方法的一些固定不变模式,拘泥于形式而缺乏弹性,忽视了方法上的灵活性。至于其操作中出现的“形式化”和“机械化”更是不足取的,它对造成中国近代新教育进程之初教学过于刻板、忽略学生的兴趣和差异性弊端,负有一定责任。因此,面对国外的教育理论,我们要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在吸收、借鉴的同时,更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有所创新、有所超越。

【参考文献】

[1] 唐钺,朱经农,高觉敷.教育大辞书[M].台北:台湾商

务印书馆,1974:1445.

- [2] 董远骞,施毓英.俞子夷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3] 罗振玉.教育丛书:第2集[M].王国维,译.上海:教育世界杂志社,1902:8.
- [4] 康绍言.薛鸿志.设计教学法辑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 [5]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60-61.
- [6]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124-125.
- [7] 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M]//张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0:9-18.
- [8] 陈树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166.
- [9]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 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10]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 [11] 李步青.新制各科教授法[M].北京:中华书局,1914.
- [12] 盛郎西.重估赫尔巴特派五段教学法之价值[J].教育杂志,1924,16(11).

【责任编辑 罗海丰】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Herbart's Five - step Teaching Method in modern China

WU Hongcheng, JIANG Baiqiang, LIU F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nding, H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To save the serious social crisis in modern time, China introduced western education system and advanced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methods. Herbart's Five - step Teaching Method is one. It has rich connotations. It was spread in China by such three ways as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books of educational theory, the Japanese teaching in China. It experienced the stages of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mitation stage, and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It ha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long - term educ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Herbart; Five - step Teaching Method; Modern China;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theory